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

杜建录 杨满忠

一 种类与数量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由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与题记两大类组成，题记类又分墙壁题记、木质题记、瓷器题记、银铜器题记、丝麻织品题记等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

1、碑刻

- （1）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陕西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 （2）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陕西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 （3）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 （4）大晋故定难军摄节度判官毛汶墓志铭，陕西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 （5）大晋国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麟墓志铭，陕西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 （6）大晋故定难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陕西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 （7）大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 （8）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洩氏墓志铭，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 （9）大汉故沛国郡夫人（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 （10）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 （11）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陕西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 （12）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陕西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 （13）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 （14）大宋国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 （15）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 （16）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立石，甘肃武威市文庙藏
- （17）黑水建桥敕碑，西夏乾祐七年（1176）立石，甘肃张掖市文化馆藏

(18) 闽宁村西夏墓残碑块，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夏博物馆收藏

(19) 陕西吴旗金夏划界碑，陕西吴旗县长官庙乡白沟村后梁山出土

(20) 敦煌莫高窟六体真言碑，元至正八年（1348）立，敦煌莫高窟藏

(21) 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河南省濮阳县东柳屯镇杨什八郎村杨氏家族墓地碑亭藏

(22)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甘肃酒泉市文化馆藏

(23) 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 河北保定市莲池公园藏

(24) 明故忠义官李仲墓志铭，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藏

2、石刻

(1) 西夏陵题刻碑座，宁夏博物馆藏

(2) 西夏陵石经幢，银川西夏博物馆藏

(3) 保定西夏文石经幢，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石，河北保定市莲池公园藏

(4) 甘肃炳灵寺西夏文题记

(5) 阴山岩画西夏文题记

(6) 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西夏文题记

(7) 居庸关云台西夏文石刻

3、砖刻

(1) 西夏陵戳字砖，九块

(2) 拜寺口方塔戳字砖，四块

4、瓷刻

(1)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刻梵文“县”字

(2)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刻汉文，残片，9件

(3)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砚刻文，2件

(4) 宁夏灵武窑瓷刻西夏文，残片，3件

(5) 褐釉瓷扁瓶西夏文题字，宁夏西吉县文管所藏

(6) 黑釉瓷瓶西夏文刻字，上海市博物馆藏

5、银、铜刻

(1) 灵武石坝村梵字银盒，宁夏博物馆藏

(2) 西夏文六字真言铜镜，上海市博物馆藏

(3) 西夏文刻字铜镜

(二) 题记

1、墙壁题记

(1) 敦煌莫高窟西夏题记，共有夏、汉文墨书、题刻 45 处

(2) 榆林窟西夏题记，共有夏、汉文墨书、题刻 47 处

- (3)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西夏文题记，3处
- (4)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题字，3处，分别为梵文、西夏文和汉文

2、木质题记

- (1) 拜寺沟方塔塔心柱墨书铭文
- (2) 拜寺沟方塔西夏文本牌题记
- (3) 拜寺口西塔中心柱木题字
- (4) 宏佛塔西夏文本简答题字
- (5) 武威西郊林场木缘塔汉文题记，甘肃武威博物馆藏
- (6) 武威西郊西夏墓汉文朱书木牍
- (7) 武威县张义乡下西沟峴山洞西夏文本简，甘肃博物馆藏

3、瓷器题记

- (1)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西夏文墨书，残片，3件
- (2)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汉文墨书，残片，2件

4、银铜器题记

- (1)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碗，2件
- (2)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钵
- (3) 灵武石坝梵字银盒，宁夏博物馆藏
- (4) 灵武石坝铭文银碗残片
- (5) 西夏文六字真言铜镜，上海市博物馆藏
- (6) 西夏文刻字铜镜
- (7) 西夏文铜刀

5、丝麻织品题记

- (1) 拜寺沟方塔丝织品墨书
- (2) 宏佛塔残绢西夏文墨书
- (3) 宏佛塔汉文发愿幡带

二 发现与整理

公元1804（清嘉庆九年），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清应寺发现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该碑夏汉合璧，张澍根据汉文碑文中的西夏“天祐民安”年号，判定另一面不认识的文字为西夏字。他把这一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1837年该文在《养素堂文集》卷十九刊出，这是对西夏碑最早发现与研究。

早期对西夏碑刻的研究往往和西夏文字联系在一起。1870年英国人维利亚（A. Wylie）最先注意到居庸关六体石刻中的西夏文，但误断为女真小字。1882年法国人德维利亚（G. Deveria）对河南开封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进行研究，发现该碑文字与居庸关石刻中所谓“女真小字”并无相通之处，开始怀疑为湮灭

的西夏文，但长期不能确认。直到 1898 年德氏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后，才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比张澍刊出《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整整晚了 61 年，应该说张澍是西夏碑刻发现与研究第一人。1958 年日本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一书，其中居庸关六体石刻中的西夏文由西田龙雄阐释。^①

1964 年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对敦煌西夏洞窟壁画、分期、题记等进行专题考察。其中史金波、白滨等在莫高窟和榆林窟 38 个洞窟中，发现各类西夏文题记九十余处，计 235 行，1200 余字。后来发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一文，公布了上述资料。^②

1972—1978 年以及近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对位于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搞清楚西夏陵区 9 座帝陵共有碑亭遗址 16 座，200 多座陪葬墓约 1/3 有碑亭遗址。目前已发掘的碑亭遗址有 11 座，出土夏、汉残碑 4411 块，其中仅存一、二字或三五字者居多，十字、八字已属难得，一、二十字者更属少见。

1972 年在甘肃武威张义乡发现西夏会款单、欠款单、西夏文木简等一批西夏遗物。^③1977 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木条桌、木缘塔、木板画、木板题记等实物，木缘塔身书梵文咒语，塔顶八角木板内面墨书“故考任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歿，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口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④

1978 年，宁夏石坝发现西夏文墨书银器。^⑤1984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三年对宁夏灵武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西夏瓷器，其中不少残片上有夏、汉文墨书或刻划题记。^⑥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从 1985 至 1991 年，先后维修清理同心县韦州康济寺塔、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贺兰县宏佛塔、青铜峡一百零八塔。1991 年又清理被不法分子炸毁的贺兰山拜寺沟方塔，获得大批夏、汉文题刻。^⑦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一批西夏文史与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碑刻题记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郑绍宗、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保定西夏文石经幢进行了热烈的争论。^⑧1981 年罗福颐发表《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⑨对西夏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进行了介绍与研究。1984 年陈炳应出版《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专列西夏的碑刻，西夏的墓葬，西夏的铜器、金银器、瓷器和竹木器等章，对当时所能见到的西夏碑刻题记进行了系统地探讨。1987 年王尧发表《西夏黑水桥碑考补》，^⑩对碑文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考证。

此外，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发表《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发掘

① 村田治郎：《居庸关》，京都大学工学部，1958 年。

② 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③ 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文物》1978 年 8 期。

④ 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

⑤ 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西夏文墨书银器》，《文物》1978 年 12 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

⑦ 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

⑧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经幢》，《考古学报》1977 年 1 期；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9 年 3 期；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载《考古》1979 年 5 期；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⑨ 载《文物》1981 年 4-5 期。

⑩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 1 期。

简报》，^①1991年张连喜、马文宽发表《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②1991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发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③在同期刊物上，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管所还发表了《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④1992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同心县文管所发表《宁夏同心康济寺塔及出土文物》，^⑤199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发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⑥1997年孙昌盛发表《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⑦2002年林英津发表《居庸关六体石刻西夏文再检讨》。^⑧

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陕西省榆林市在文物征集和打击文物走私和盗墓的专项斗争中，征集或缴获到拓跋守寂墓志铭、李仁宝墓志铭、李仁宝妻破丑氏墓志文等党项拓跋部家族墓志铭。^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十里梁党项拓跋家族祖茔也相继出土了李仁福妻湊氏墓志铭、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李彝谨墓志铭、李光睿墓志铭、李光遂墓志铭、李继筠墓志铭。围绕这些碑刻，学界发表了系列研究文章。^⑩

三 文献价值

蒙古灭夏时，将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文物典籍付之一炬，加之元修宋、辽、金三史，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题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下面扼要述之。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述西夏太后与皇帝应瑞诏命重修凉州护国寺塔，塔成后刻碑记其功。碑文在记载这件事的过程中，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如夏崇宗乾顺赐予护国寺“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西夏文“官作”二字非常重要，第一字为“农、耕”意，¹¹为依附于官府的农业生产者或农奴，这一重要资料，使我们对西夏社会经济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碑铭中记载的“大夏”、“大白高国”，是研究西夏国名的重要资料；关于凉州地震的记载，是重要的地震史料；夏汉两种文字对照，则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前述西夏文字消亡数百年后，通过凉州“西夏碑”才重新认识的。

明代西夏文石经幢刻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幢后记立幢人近百名，其中有平尚、移讹、命屈、昔毕、依罗、嵬名等党项族姓，说明明代党项人仍然存在，西夏文也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另外，河南省濮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甘肃酒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以及河北保定“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为我们提供了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的活动情况。

① 《考古》1987年10期。

② 《考古》1991年12期。

③ 《文物》1991年8期。

④ 《文物》1991年8期。

⑤ 《文物》1992年8期。

⑥ 《文物》1994年9期。

⑦ 《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

⑧ 《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

⑨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⑩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年6期；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3期。

¹¹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大致可以划分为功德发愿文、供养人题榜和游人巡礼题名三种类型，这些题记既是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又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题记记录了王子、贵族、官吏、高僧及僧俗平民的姓名、官职和在莫高窟、榆林窟的宗教活动，提供了西夏国名、纪年、官制、封号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资料，如题记中所见比较完整的西夏人名有 60 多个，其中可定为党项姓氏的有息玉、嵬名、杂谋、麻尼则、嵬立、酪布、骨匹、那征、味奴、讹三、千玉等数十个。^①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木板题记，提到西路经略司、都案、西经略司都案等职官与大夏天庆元年（1194）、大夏天庆八年（1201）等年号。经略司一职最迟在天盛年间（1149-1169）就设已设置，《番汉合时掌中珠》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均记有这一机构，按照法律，地方重大军政事务都要上报经略司。《金史》卷 61《交聘表》记载，乾祐八年（1177 年）十二月，“遣东经略使苏执礼横进”，显然，这个东经略司与上述西经略司是相对应的。

宁夏石坝发现的西夏文银碗，分别在碗底用西夏文写明其重量是“三两”和“三两半”，经实测，其重量是 114 克和 137.5 克，由此可知西夏“两”的单位值约 38-39.1 克，与宋朝“两”的单位值 39-40 克相近。^②这是两件非常重的资料，它填补了西夏衡制的空白，同时也说明西夏在衡制方面“略与宋同”。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残片上墨书“三十吊五十串”六字。如果千文一吊计算，“三十吊”分成“五十串”，则每串也即一吊为六百文。宋朝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金代以八百文为一贯，则西夏有可能以六百文为一吊（贯）。^③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涉及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僧判、赐绯、都大勾当、仪鸾司等西夏国名、年号和职官制度等，其中“仪鸾司”《番汉合时掌中珠》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不载，可能设在西夏前期，其职掌与元昊建国前设置的翊卫司同，或干脆是翊卫司的另一称呼，负责卤簿仪仗，西夏后期被其它机构所取代。

唐五代宋初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是早期党项与夏州拓跋政权的真实记录，它解决了党项夏国历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如关于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自唐代以来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则认为出自羌族。^④持鲜卑说的依据是唐林宝《元和姓纂》，该书记录西夏王室先祖拓跋守寂是鲜卑族。持羌族说的则认为鲜卑拓跋部在历史上较为著名，“因而将党项拓跋氏误认为是鲜卑拓跋部之后”。但这仅仅是怀疑和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立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拓跋守寂墓志铭”，明确记载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显然元和年间（806-820）成书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的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均认

①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 年 3 期。

② 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载《文物》1979 年 12 期。

③ 张连喜、马文宽：《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 年 12 期。

④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 年 2 期；《再论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 4 期。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 年 1 期，认为拓跋氏出自鲜卑族。李范文：《试论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民族史论丛》1980 年版；《再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54-155 页。史金波：《西夏境内民族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 1988 年；《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 年 6 期。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增订本，认为属于羌族。

为党项拓跋氏出自鲜卑。

史书记载西夏的姑表婚是单向的，如开国皇帝李元昊娶舅女卫慕氏为妻，第二代皇帝谅祚娶舅女没藏氏为妻，第三代皇帝秉常娶舅女梁氏为妻。拓跋家族墓志所记的姑舅表婚则是双向的，李彝谨（拓跋彝谨）的岳母为拓跋氏，显然是舅舅的儿子娶姑姑的女儿为妻。^①从而印证了西夏文有关“为婚”与“舅甥”、“婆母”与“姑母”的含义。^②

拓跋家族墓志铭的发现，使夏州拓跋李氏世袭关系更加清晰，史籍中的谬误也得到了纠正。“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浚氏墓志铭”记浚氏与虢王李仁福育有五子，年齿顺序为长彝殷，次彝谨，三彝胤，四彝超，五彝温。彝殷（又名彝兴）、彝超新旧《五代史》、《宋史》有记，长兴四年（933）李仁福卒，彝超继立定难军节度使，清泰二年（935）彝超卒，彝殷继立。可能彝超袭位在前，彝殷袭位在后，故《宋史》误记为“彝兴，彝超之弟也”，“浚氏墓志铭”可纠其谬。“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记其“宠弟五人”，分别是光文、光宪、光美、光遂、光信。李光（克）文和李光（克）宪，就是后来迫使李继捧交出节度使权力的“从父”。亲叔父反对李继捧袭位，故史称夏州“难起家庭”。

墓志铭称拓跋夏州节度使为“府主大王”，“李光睿墓志铭”更是称其“俨万乘之皇威，总八方之戎事”。“府主大王”有着国君般的权力，是夏州地区的主公和大王，它印证了《宋史·夏国传》关于“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的结语。

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多载志主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如后周广顺二年（952），李彝谨“归葬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后汉乾祐三年（950），李彝谨妻里氏“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乌水之原”；后晋天福七年（942），李仁福妻浚氏“祔葬于乌水河之北隅，端正树之东侧”；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李继筠葬于“端正北原之上，祔于先茔”。奉政里又作风正里，这里有一条乌水，茔地所在的乌水原台地，当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附近的十里梁上，乌水即今天的纳林河，因为上述墓志就在这里出土，这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夏州地理，增添了新的网点和坐标。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06AMZ001

（作者通信地址：杜建录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杨满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

① 《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铭》。

② 史金波：《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民族研究》1992年1期。